

两个洋人眼中的慈禧太后

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



◎「英」濮兰德、贝克豪斯 著
◎牛秋实 杨中领 译

尊贵光鲜的宫廷生活之下，
暗流汹涌的政治斗争，
虎视眈眈的列强环伺，
一个拥有最高权力的女人，
有着怎样的不为世人所知的
「另类面孔」？

天津人民出版社

慈禧

统治下的大清帝国

◎〔英〕濮兰德、贝克豪斯 著

◎牛秋实 杨中领 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 / (英)濮兰德, (英)贝克豪斯著; 牛秋实, 杨中领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3

书名原文: China Under The Empress Dowager

ISBN 978 - 7 - 201 - 05439 - 1

I. 慈… II. ①濮…②贝…③牛…④杨… III. ①历史事件 - 中国 - 清代②西太后 (1835 ~ 1908) - 生平事迹
IV. K249.05 K827 = 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6026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10.625 印张 2 插页

字数: 250 千字 印数: 1 - 6,000

定 价: 30.00 元

出版说明

《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是英国人约翰·濮兰德和埃德蒙德·贝克豪斯合写的一部慈禧的传记。这是第一部全面记述慈禧的传记。濮兰德是当时的《泰晤士报》记者，贝克豪斯出生于英国一个金融世家，1898年初他只身来到中国。在北京期间，濮兰德和贝克豪斯都结识了不少中国要人，搜集了大量有关慈禧及其清朝政治、社会状况的资料，这为他们写作该书积累了大量的素材。该书1910年在英国出版后，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多次再版。这次我们推出《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的中译本，旨在使中国读者了解作为西方文化的“他者”是如何认识当时的中国社会的，从而更加全面地认识慈禧太后以及晚清的社会和政治。

此书的中译本经过编辑与译者的反复修改，终于能够呈现给读者，其间虽然辛苦，但现在看来还是值得的。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本书的两位原著者毕竟是当时的西方人，对中国的社会有一定的隔膜，加之他们是在西方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的背景下来中国的，有着“强势文明”的优越感，这就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到了西方殖民者的立场上，这就使本书的某些观点和措辞有失偏颇甚至是错误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慈禧太后的评价多有不恰当之处，且有一些赞扬称颂之词。如称赞慈禧太后英明睿智，坚决果敢，是具有极强统治能力的君主，堪与拿破仑这样的欧洲君主相媲美。并且，多处歪曲了广大人民对慈禧太后的看法与态度，一方面将慈禧太后的诸多行为称为“善举”、“善行”；另一方面极力鼓吹广大人民对慈禧太后的“敬仰与拥护”。慈禧太后作为晚清数十年政局的实际

统御者,虽然有其受当时时代、历史、社会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行为客观必然性,但是其作为腐朽的封建统治者,对中国当时社会诸般苦难,如主权的丧失、领土的割让,仁人志士的被冤杀等,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我们在认识和评价慈禧太后时必须认真对待,并始终秉持的观念基点。

第二,对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持否定态度。如分别称捻军和义和团运动为“捻匪”、“拳匪”等,虽然这些都是引自中国的历史文献,但仍是我们无法接受的。

第三,为西方殖民者的侵略粉饰、歌颂。如认为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只是为了打通与中国的贸易渠道,同时也是帮助清朝政府镇压国内的“叛乱”,而并非赤裸裸的侵略。

尽管我们对书中的行文作了必要的删改,但上述种种错误观点,仍无法悉数摒除。因而,还希望广大读者能够带着批判的眼光去阅读本书,看清作者的根本立场。

译者序

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并没有从这次惨败中汲取教训,更没有真正奋发图强的表示,反而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帮助”上面。由于三国干涉还辽的缘故,清朝三品以上的官僚大都不能识破俄国的险恶用心,而对俄国表示亲善,希望俄国成为中国的庇护者。当清政府同俄国打交道不久,旅顺就被俄国强行租借去了。于是,清政府就转而接近英国和日本。

但是,戊戌变法时期,后党认为英国支持光绪帝,亲近帝党和维新派人士,这使慈禧太后大为失望。梁启超逃亡日本,慈禧太后派人行刺而不得,她对日本也动了火。慈禧太后在戊戌政变后一反常态地对列强翻脸,固然有列强侵略之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列强干涉她废立的阴谋。于是,她企图借助义和团的力量去孤注一掷,要和帝国主义列强拼个高低。

义和团借助于民间传统的力量,盲目排外,不能用正确的策略去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但他们的勇敢行为毕竟展示了中国人民抗敌的决心。西方汉学著作往往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不愿暴露自己的侵略本质,而对义和

团评价过低,对慈禧太后也过多地赞美,这是不足为训的,我们必须进行批判。

义和团运动打乱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特别是在义和团最为活跃的地区已经出现了“纪纲法度,荡然无存”的局面;义和团失败后,把持朝政的顽固派集团被摧毁;这些都在客观上为社会改革扫除了障碍和阻力。在反抗八国联军入侵战争中,清政府所暴露的腐败已为全国人民所不齿;义和团的笼统排外也行不通,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仍是时人所思考的重大课题。经过这场战火洗礼的人民,在极端痛苦的反思中或走向反满革命,或呼吁变法改革以图自立。所有这些压力已使清王朝难以循旧统治下去了,不得不打出“新政”的旗号以缓和矛盾,争取人心,巩固其统治。而新政的颁行恰恰是清朝统治者给自己敲响了丧钟。

该书原由尚福恩女士和张献忠先生共同翻译,但由于家务和工作问题,他们仅翻译了第一、二章,后交由我和杨中领翻译。在翻译的过程中,除了将部分对慈禧过多溢美的地方做了删改外,基本上保持原著的本来面貌。因为晚清的历史,正是宗法制社会日益衰落而民主制社会不断发展的历史。作为晚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她不仅要面对世界列强的欺凌,更要应付国内日薄西山、摇摇欲坠的局面,她百般挣扎,却难免颓势。

牛秋实

2008年5月18日

英文版序

《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是利用丰富的故事写成的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经典作品，是大清帝国最后危机阶段的有文学价值和权威的历史记录，这两个优点已经因第三次出版得到了证明。正如雷登的杜夫达克教授对这本书的评价：“对过去的那些年代的掌故非常熟悉”。而且该书也被一些专业的学者如莫斯教授、里基拿德·约翰斯通先生及麦克奈尔教授看重。自第一次出版之后，书中关于景善阁下的日记等部分章节显得格外重要。这一点 1924 年杜夫达克教授就充分地认识到，并将其完整地出版，并且有了英文译本，日记中的一部分还是布兰德在英国博物馆找到的。出版完整的文本，就是因为日记本身作为历史文献有其重要的价值。尽管杜夫达克教授认为日记中的许多注释不是很准确，但是这并不能损害日记的可信度。只是最近才引起了或多或少的质疑，部分原因是只有汉学家们才能理解这一点。但对普通读者来说谈这些问题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在阅读的时候一定会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些更可信的问题。

首先，发现了这些短篇日记并把它翻译过来的是本书作者之一的埃德蒙德·贝克豪斯先生。他于 1898 年到达中国，之前的几年中他一直在学习汉语和日语。他学习日语已近五年，而这首先是要学会平假名或者说一般民众所掌握的音节表。在学习的过程中，他逐渐研究了其他日文文字和普通文献中草字的用

法,因此他到达中国的时候,已经能流利地阅读日文中草字书写的文献,然后从日文草字再到中国的草体字、草书,特别是“景善日记”中的草书。因为在中国学习了两年的汉语,加上他的聪明才智可以使他很容易地将日记中的草书翻译成英语。埃德蒙德·贝克豪斯先生是天生的语言学家,这些翻译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困难,而且他一眼就能识别出他看到的草书文献(不仅能一眼识别出来,而且能像评论家那样提出自己的看法)。

当联军于1900年8月15日占领北京以后,贝克豪斯先生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就住在如今被称为莫里逊大街的住宅区,就在广东会馆的北面。因为那里当时在俄国人的控制之下,所以他决定搬往英国人控制的京城地区。罗兰森上尉指挥的俾路支团,被分派到景善住宅附近的一条名叫玉河的人工运河西岸。一些评论家对日记中不重视北京的地形提出了疑问,这条意见很中肯,他们认为这条河离景善的住宅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距离,上面还有一条碎石铺成的路,而景善的很大一部分家产(后来到了晚清的将军张勋的手里,在1917年复辟帝制的时候被故意破坏了)现在被北京的联合教会所占。当时的英国外交使节由一小队韦尔奇火枪手护送以保证安全,贝克豪斯先生就住在景善的房屋的一角。他到达的时候,发现两个锡克教哨兵在正门里,有八个士兵组成的小分队在锡克军官带领下在内院里看守。贝克豪斯先生被授权占有整座房子,当然除了锡克小分队所占领的部分之外。他还得到允许有权使用这里的任何书籍和报纸。这些书籍和报纸是非常多的,他如果发现了任何关于义和团的文献或者义和团曾经占领房屋的迹象都要报告给英国当局。景善的长子恩澍就因为藏匿义和团团员和杀死他父亲的罪行而受到控告。贝克豪斯先生住在房屋外间的客厅里,作为他的起居室,那里非常凌乱。在房屋的西侧有一个小的房屋是景善的私人书房。里面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两个大书柜。地面是砖铺成的,地

上有几个盒子,里面的东西已经被抢走了,到处是散落的纸,有些是成捆的,大多数没有被解开就被扔在地上,有许多书相当贵重,也被扔进纸堆中去,地上堆着的纸有几英寸厚。其中一只盒子里装满了景善的官方文告、便函和书信,官方上奏的抄件,草拟的奏折之类的东西。与走廊相连的一个偏门里也散落着纸张。在院子里甚至还有烧毁卷宗遗留下来的灰烬。这些混乱可能是因为掳掠而造成的。抢劫者翻得乱七八糟,是希望找到银子,烧毁的纸说明抢劫者想毁灭文献等其他痕迹及证据。

贝克豪斯先生的首要任务是找回书籍,因为这些书都是关于宋代的哲学书籍。要想找到关于义和团的活动的证据,就要对那一大堆纸进行仔细研究。他首先在一堆记有日期的纸上发现了重要的文献,这能证明朝廷离开北京的日期。其他同样的纸条也被找到,上面有景善的签名,这些都是景善做的记录。贝克豪斯先生当时担任巴罗将军的翻译,立刻把这个重大发现告诉了将军。英国的最高当局也得到了报告。几天以后,恩澍被逮捕了,以谋杀罪和藏匿义和团员罪被刑部审判。证据就是从景善的日记中发现的,在日记中景善对恩澍同情义和团做了记录。当萨陶先生接替克劳德·麦克唐纳担任驻北京的英国公使的时候,贝克豪斯先生非常注意这些文献,他发现利用这些文献能够记住义和团魁首的名字如芬车和桂春等。萨陶先生建议出版,但不是马上,而是建议推迟到慈禧死之后再出版。

找到有价值的文献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成堆的文献根本没有动过,这些都是大量的私人信件,里面充斥着每天的琐屑的记录。这一大堆纸由一些松软的各种大小的纸片组成,里面包含着有关一百多万人的记录。

在接受了萨陶先生的建议后,也因为有其他的事情分散了贝克豪斯先生的注意力,直到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之前他都没有认真考虑出版的事情。最终这个工作是和布兰德先生一起合

作完成的。贝克豪斯先生怀疑是否能找到一家出版社。这种考虑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合理的,因为不止一家伦敦著名的出版社拒绝出这本书,但最终威廉姆·黑内曼接受了出版的请求。

接下来,是关于日记的手抄本的问题。关于景善的其他大量文献,都是由大小不一的松软的纸写成的。日记中一部分需要翻译的内容被送往伦敦,并同意作为布兰德先生的个人财产,而最初发现的手抄本被放在伦敦博物馆的学者真迹中珍藏。没有被翻译的部分,只是一小部分,被翻译以后,并不出版,为贝克豪斯先生个人所拥有。贝克豪斯先生希望当时出版一部完整并带有注释的译版,但是由于健康、视力下降和其他原因而搁浅。1926年,也就是两年以后,杜夫达克教授出版了大英博物馆手抄本的译版。如果有条件的话,他还想出版一个摹写本。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直到1936年3月,杜夫达克教授提出要购买这本手抄本。1932年,现存的手抄本连同其他文献和书籍,通过贝克豪斯先生的中国经纪人张合才先生出售了。而张先生还没有来得及把这些东西交到购买者手中便被谋杀在北京的家里。

杜夫达克教授很希望于1924年由他评注大英博物馆中的日记部分。他对这些文献很感兴趣,他于1936年不惜一切代价要购买手抄本余下的部分,这样他就能在著名学者的编辑和赞助之下将剩余的日记部分翻译出来。

关于日记本身:1900年景善已经78岁,无疑这位老年人遭受了老年疾病之苦。其中之一就是他听力很差,虽然算不上很严重的耳聋,但也有必要引起注意。这种障碍也许偶尔会被来访者所忽视。当他被家庭其他成员的不和所折磨的时候,可能会被夸大成对他的侮辱。他的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不和,其中一个人杀死了长辈。景善的听力不好并不妨碍他后来与别人的谈话。在文献中经常提到他与来访者谈论宫廷和朝中流传的消息。后来我们还可以看到,日记的写作并不需要依照拜访者的谈话内容来

进行。年纪大的人的另一个弱点是对立刻发生的事情记性不好，这点缺陷就是偶尔在日记中本应该写成“今天”，或者“今天上午”或“今天下午”都写成了昨天发生的事情。作者有记日记的习惯，这位 78 岁的老人很有可能在退隐的时候经常记日记。如果是这样的话，用笔来记日记应归于他疲惫的心情。从另一方面来说，实际上是发生在当天他头脑里的事情，他很有可能用“昨天”的字眼把第二天上午发生的事情记录进日记里，这就容易理解了。在世界上几乎没有像这样重要的日记来记载所发生的重大事情。

正如日记所揭示的，景善对于当时的许多情况都很熟悉，有些人甚至与他的关系非常亲密。当他记录那些人的拜访的时候，他自然还要回访，尽管他不会直接负责处理这些国家大事，但总是与他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这些消息对他来说是非常有趣的，尽管他不必要完全记下来，也没有打算出版的意图，所以他草草地记录了下来。此外，他偶尔提到了自己的家事，但这些不是经常提到，对于一家之主来说也没有必要特别热心于此。在日记中简要地提到他的部分房屋被义和团所占用，而且是应他儿子的邀请，明显是慎重的。如果在这些事情上展开，或者是带着敌意的批评态度去评论，在那种情形下是不明智的。至于抢劫他钱的儿子，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是最终杀害他的一个儿子，是不可能尊重他住的房屋或者他日记中的秘密的。事实是日记作者对义和团所持的同情态度，与其说是削弱不如说是加强了这种犹豫的意识，在这种意识中，他的家庭会被看作是对他秘密的侵犯。因此他有理由将这些发生在家庭中的事情也一笔带过。

一些对日记的批评指出，日记所描述的东西作为智力的参与和对事实的还原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尤其是在他笔下提到的人名和地名。至于后者，我们可以看到，景善在近八旬的年纪所记住的宫殿名称和亲王名字，并不靠他年轻时以及后来担

任官职时的记忆。作为一位年纪大的绅士我们应该原谅他的记忆力丧失和笔下之遗漏,但是以此作为对日记整体的批评是站不住脚的。

至于所谓的伪造或者说剽窃,至少可以对此作出三点解释。第一点,景善日记中相似的段落至少应在其他地方能够发现,这样就能很容易地重新确定景善日记记载的原型。我们以王文韶为例。早在1902年,贝克豪斯先生本人把日记借给王文韶看,他对这一切都很熟悉。当王文韶把日记还给贝克豪斯的时候,对他说,日记中的有些细节是他本人提供给景善的,并补充说在1900年6月到8月之间景善经常拜访他。因此有理由断定这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而王文韶出版的杂志和对日记的评论,在裕禄看来有互相重复的嫌疑。贝克豪斯先生本人借给凤山将军、巡抚桂馥、铁良(朝廷总编修后来是陆军部部长),文连(内务府总管)等看,后来还借给其他人看。凤山还把日记拿给庆亲王看,庆亲王对日记中提到他的内容非常恼火,因为日记中在提到他对义和团的态度上持中立的立场,他还对景善这个愚蠢的老傻瓜非常不屑一顾。但是没有一点迹象显示景善因为年老就被那些年轻一代看作老不中用的浅薄之流,这有助于解释他笔下的遗漏和不连贯之处。

第二点,在文献、便笺和笔记中前后还有不断的变化,这些文献在流传的过程中,抄写者出于自己的目的或者为了满足个人的好奇心,他们最感兴趣的无疑是景善的生活。这就造成各种文献之间的相似性。但是第三种解释,尤其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显得非常重要。据某些人认为,所谓的重复不仅仅出现在某些段落,甚至整个部分。对于那些理解中国文学作品或者文体的人来说,对这些明显的类似,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在官方文件、演讲、甚至关于任何问题的布告中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这是过去的文学和历史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其魅力构成所在。一般百姓和

学者的文体都是在消化并对古典评论家和古代的历史学家的评论中形成的。一篇文章、一首诗或者一篇公文,对于作家和过去的思想家来说是否有吸引力不仅仅是文学成就本身的问题,而且是关乎文学品质的问题。目前普遍参考的是过去的准则和标准,谈论过去的实际政治,因此学者和官员的观点都是以古典学家、评论家和古代的历史学家的言论来进行论述。因此对于西方学者来说,认识所谓的“剽窃”问题,也不过是运用古典知识的问题。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或者每一篇公文都是镶嵌着宝石的古代作品。正如格兰尼特所说:“个性与奇迹同在。”这最适合解释以下的情况:只要传统的官吏存在,无论是在公文还是在私人书信中的“剽窃”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最终的结局。

这部日记的可信性因为其智力参与也进一步受到质疑。在朝野经常会有大量的谈论和再讨论、提到和反复提到的问题。例如在给皇帝上的奏折,发给各省总督巡抚的电报,即席的演讲,帝国的抄件和布告,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备忘录被草拟和重新草拟,手抄的文件在最后定稿之前的反复熟读,朝廷的讲话被讨论直到最后自信可以传达下去,上呈朝廷的奏折,里面包含着朝廷布告的草稿,有时也带在身边好几天,在上呈朝廷的时候,可以拿给朋友传阅。因此日记记录在6月10日军机大臣济岫拜访日记作者的时候,给作者看朝廷诏令的草稿,里面有命令断绝与外国人的关系的内容。直到十天以后这篇草稿才再度出现。荣禄在被召见的时候,他提出不太中听的意见之后,济岫才得到朝廷的召见,而且是从他的皮靴中取出草稿并递交上去的。对于那些多嘴的人来说在当时又有多少自信呢?如果景善草草地记录下来其内容并把它记进日记,就能证明他的记录不可信、他的智力参与或者剽窃吗?

很明显袁昶的上奏很大程度上是由荣禄煽动起来的,但是这就说明他很鲁莽,去向朝廷提意见的时候违背了礼仪。对于那

些地位比较高而且受到支持的官员来说,煽动别人上奏远不是什么高尚的行为,因为这些鲁莽的下级官员会受到非正常对待,朝廷对于他们的接待也是出于某种风声。袁昶在上奏中提出不要对外国人采取激烈的行动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那种人道地对待德国使节拜伦·冯·凯特勒的态度,使得朝廷对他充满了偏见。他为那道大胆的奏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以一定要考虑当时的情况,要注意他们预先打草稿的事实。他们要先打一个初稿然后再进行正式草拟,以备参考和修订,最后再选择合适的时间提出上奏。袁昶明显早在拜伦·冯·凯特勒被杀以前便已考虑了对待外国使节的所有问题,但是直到一周之后他才和许景澄上奏弹劾那些在背后支持义和团的高级官员。这两个人之间不知会面了多少次,他们与荣禄经常谈论事情,他们也许认为可以依靠荣禄。有多少人与他们有利害关系?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严格的信任”是远远不够的。章京,属员,职员,抄写者,甚至信使,贴身男仆和守门人,都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中的任何人都随时准备把消息卖给愿意付钱的人。在那些非常岁月里,尤其是义和团爆发的那一年,当宫廷热衷于密谋之时,当一个党派策划反对另一个党派,一个派系想要搞垮另一个派系的时候,消息的私下流传,消息的传播常常就发生在幕后。因此国家抱怨消息泄露,从而更喜欢以官方法令来保证安全。景善处于有利的地位,他不仅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而且知道即将发生的一切。他与许多要员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他记录了这些拜访者的访问,而在日记中的每一页上不用签字,不用付一两银子就得到了朝廷和官方的消息,而且他所接触的这些事情的来源都是可靠的。有时他甚至提前得到了这些消息,有时甚至他正在写的那些内容因为某种原因明天才能被发表抑或会被延迟。这些都不止一次地发生,关系着一些重大或不重大的事情。景善不是一个有组织地利用朝廷和官方的消息的人。莫里逊享有很高的声

誉,他在议会里专门签署文件,在所有的事件中都参与了谋划。在西方人的思想中,对于这方面非常松弛,但是在中国的各个部门中,这种“智力参与”并不需要特别的才智。那种认为一些智力参与大多不可相信的话,我们怎么能指望杀死拜伦·冯·凯特勒的报告在他被杀之前能在纽约出版呢?

最后,评论家们抱怨日记遗漏了许多有趣的事情,但是这通常是日记的方式,除非这些日记的写作是为了出版的目的。景善的日记只适合景善自己的奇思妙想,也许考虑到有一大帮义和团众在他家居住,在这关键的时刻,他的想法还是有点温和。

以上所述,主要是针对日记的可靠性,因为要在北京出版,所以不厌其烦地谈论了这些话题。

北京,1938年12月

目 录

译者序	1
英文版序	1
第一章 叶赫那拉之家世及慈禧之幼年	1
第二章 逃亡热河	9
第三章 载垣的阴谋	18
第四章 首次垂帘	30
第五章 曾国藩与太平天国的灭亡	37
第六章 慈禧和太监	47
第七章 礼节问题	62
第八章 同治帝亲政及其驾崩	66
第九章 吴可读的抗议和自杀	73
第十章 慈禧成为唯一的摄政者	84
第十一章 退休的慈禧	93
第十二章 1898 年的维新运动	104
第十三章 百日维新	113
第十四章 1898 年的政变	121
第十五章 慈禧重新摄政	128
第十六章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	153